

北伐在东路

BEI FA ZAI DONG LU

曾宪恒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伐在东路

曾宪恒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粤新登字 09 号

责任编辑：筱 杜 程 江

封面设计：杨传健

北伐在东路

曾宪恒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梅州银燕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185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5361-17140-O/K·63

定价：8.30 元

广东省高教厅
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川史為鑑
溫故知新

賀常寬恆先生力作
「北伐在東路」出版

陳勝莽

一九九五年夏
于中山大學



陳勝莽教授 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博士生導師

序

曾宪恒同志的力作《北伐在东路》是北伐战争史研究的新成果。

由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至今即将70个年头了，然而史学界研究这场气势磅礴战争的时间并不长，系统研究并出版专著还是近些年的事。在已出版的著作中，我们发现，无论在理论分析的深度上，还是在史料搜集的广度上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待于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加以解决。

众所周知，在北伐战争中，北伐军兵分左、中、右三路，向北洋军阀展开猛烈进攻。从现已出版的有关北伐战争著作看，对右路军、中路军开辟的两湖战场和江西战场的研究比较深入，对这两个战场各战役的叙述也颇具体细致，不乏有真知灼见之作。但对于东路军独力开辟的闽浙战场的研究则显得有点逊色，特别是对闽浙战场诸战役的描绘往往轻描淡写，墨笔单薄，使读者不能从中窥见闽浙战场厮杀之全貌和东路军建立的丰功伟绩。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伐在东路》一书的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对东路军开辟的闽浙战场，进行深入的研究，客观地从多方位、各层次加以考察，秉公直书，言之凿凿，填补了东路军闽浙战场这一段历史在史书上留下的空白。这是《北伐在东路》的重要价值之所在。不仅如此，《北伐在东路》的作者还以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分析了国共合作方针的由来与演变，以翔实的史料叙述了闽浙战场的各次战役；既探讨了北伐东路军与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的历

史作用，又客观评价了东路军及其将领所起的作用与建树的勋劳。在阐明国共两党成员在北伐东路军与闽浙战场诸战役中的作用时，着重剖析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进而在客观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新见，即上海第三次起义的成功乃是国共两党党员协同努力、两党武装力量共同战斗的结果。这种唯真唯实的治学态度，在《北伐在东路》一书中随处可见。这也是《北伐在东路》一书难能可贵之处。

作者1964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高等学校工作，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密切联系实际，尤其紧密联系粤东革命斗争实际的特点。从他发表的众多论文和出版的专著中，可以看出作者善于运用史论结合的原则，并致力于地方革命史的研究。本书则拓展到研究北伐战争，深入钻研东路战场。这种学术研究上不断进取的精神值得年青同志学习。尤须指出的是，作者作为教师，还担任嘉应大学教务处长这一职务，教学与行政工作繁重，其学术研究工作是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暇进行的。这种刻苦钻研精神，这种在学术上披荆斩棘、勇于探索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今天，海峡两岸的团结，中华民族的统一，已成为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第三次国共合作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曾宪恒同志所撰《北伐在东路》一书，以其史料的丰富，叙述的全面，持论的公正而问世，这对于推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及两岸关系的接近是会起到良好作用的。可以肯定地说，这本书在学术上是有见地的，在政治上是站得住脚的和有益的。我想，读者在阅读这本书后定会得到很多裨益的。当然，读者还会期望作者今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熟练运用史料和深刻理论分析上不断前进，再著新篇。

汤锐祥

一九九五年五月四日于广州中山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北伐前南北军政态势	(1)
第一节 国共合作共策北伐.....	(1)
第二节 广州国民政府与北伐	(19)
第三节 出师北伐的各项筹划	(39)
第四节 北伐东路军与黄埔军校潮州分校	(49)
第二章 闽浙战场中的福建诸役及其历史地位	(59)
第一节 福建诸役史略	(59)
第二节 福建诸役的若干问题	(83)
第三章 闽浙战场中的浙江诸役及其历史地位	(102)
第一节 浙江诸役史略.....	(102)
第二节 夺取南京.....	(140)
第三节 浙江诸役的历史地位.....	(146)
第四章 国共合作战败孙传芳夺取上海	(162)
附 录 北伐在东路大事记	(175)
后 记	(196)

第一章 北伐前南北军政态势

第一节 国共合作共策北伐

北伐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北伐的胜利，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胜利。因此，在研究北伐问题时，有必要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方针的由来及其演变。



国共合作的方针，首先表现在合作的形式问题上。它有个确立与演变的过程，从以下史料可窥其概貌。

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二册，1981年版）公布的史料，早在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晤了孙中山后，形成了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想法，并于1922年4月向中共提出此建议，但被中共拒绝。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虽然认为“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却主张党外联盟。鉴于孙中山对此建议的冷淡，中共曾考虑组织一个新的民族革命的政党，并决定先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关于此问题，陈独秀在1926年11月的报告中谈到：“再有一种见解是承认要有一个民族革命的党，但是否要在K. M. T（指国民党——作者）之外另造一个民族党？本党许多同志在过去都有此意见。”李立三也说，“党当时组织民权大同盟，的确有一个企图，准备把民权大同盟转

变为民主革命的政党。”中共反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马林把国民党看成是民族主义的政党，甚至因为它与工人联系的紧密，称之为“工人党”。当时马林还认为，“国民党的组织形式是松懈的，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推行我们的思想和开展革命的反帝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①

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在1922年8月的西湖会议才决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与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但对国民党的认识仍较模糊，直至1923年6月中共“三大”经过进一步讨论，认为：“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使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②那么，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是什么呢？参与对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工作。改组国民党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共产党人进行民主革命的基本工作。在《向导》载文说，要进行民主革命，“我们必定第一步先要组织平民的政党——我们自己的国民党。……然而要使他能如此，必须我们自己参加。”

尔后，随着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变化。当时的国民党政要廖仲恺说过，国民党“自同盟会以来，既无精密组织，……其后经过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均属无甚组织。”^③ 鲍罗廷与中共是按布尔什维克党的方式帮国民党进行整建的。国民党“一大”决定“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④，通过制订党纲党章、重新登记党员、选举中央机关、整建地方各级组织，国民党开始由散漫转变为比较集中、纪律严密的党。

①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5—1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②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③ 瞿秋白：《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向导》第49期，1923年12月。

④ 廖仲恺在1923年12月9日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革命文献》总第1085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

促使国民党组织形式严密的措施,和中共中央、马林在酝酿国共合作之初,把国民党组织的松懈性作为“党内合作”的可能性的观点是相悖的。对此,有人提出了异议,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也认为“国民党的组织是过于集中而机械化了”,这样,“工农加入不便,”^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同时鉴于国共合作中开始出现的一些纷争,中共中央在1924年5月的扩大会议上认为,“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份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所以,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首要的工作是“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其次才是“帮助国民党办好组织机关。”^②

由于国民党组织成份复杂,国民党内对当时的改组方略形成对立的两派:反对派与支持派,史称为“右派”和“左派”。1924年6月18日,当国民党右派提出了“弹劾共产派案”,试图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限制共产党人的行动时,陈独秀于7月13日致信魏金斯基说,“我们不能无条件和无限度地支持国民党”。中共中央于21日发出了第5号通告,认为“弹劾共产派案”的发生有可能使国共两党分离,指示各地作好准备,其内容有:“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③。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弹劾共产派案”在8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失败,共产党遂取消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虽然第一次扩大会议把国民党的组织工作放到次要地位,但直至五卅运动,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中对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仍十分重视。

五卅运动后,统一战线内的阶级斗争趋于激化,国民党内,共

①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317、299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② 参见《中国共产党史报告选编》第53页。

③ 转引自格鲁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马恩列斯著作研究会编。

产党及左派与右派的矛盾一再掀起波澜。戴季陶主义出笼，其主旨就是反对国共合作，尤其是党内合作的形式。

1925年10月，中共第二次扩大会议认为，由于戴季陶主义的出现而觉得已是两党脱离关系之时，那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但又指出，我们应当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束缚无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的联盟，而且能扩大这一联盟。这种联盟一是“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二是在“非必要时，我们的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三是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左派中划分出来，避免直接卷入国民党左右派斗争的旋涡。中共中央的决定，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允许。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说：“最近一次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决定在各方面从组织上划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界限，确定同国民党的关系不再是从前的密切同盟，而是政治联合。”

在国民党“二大”，中共中央主动同“西山会议派”首领进行了谈判，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不希望“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动员他们回粤参加国民党“二大”^①。其目的在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政治联合”的精神。为贯彻中央精神，张国焘担任了这次会议的中共党团书记。会议选举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个，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②。但是，共产党人仍然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在常委会和政治委员会中工作；在国民党中央的八个部中，有四个部实际任部长、副部长或秘书长的共产党人主持工作。

1926年3月的“三·二〇”事件后，陈独秀坚决地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但被共产国际所否定^③，然而却促使中共中央全面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1925年4月—1926年1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以下简称《文献》）第一辑，第107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②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67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册，第119页。

地贯彻了“政治联合”的政策。1926年7月的中共第三次扩大会议认为,“右派及武装的中派之进攻”,是因为党“没有实行去年10月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广东的经验证明了“包办国民党机关,自己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的工作”,是错误的^①。根据这一方针,共产党人默认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退出了国民党中央各部的工作,同意组织两党的联席会议。

另一方面,中共的第三次扩大会议又提出了改变国民党组织形式的主张。认为“国民党的组织不能是一阶级形式的集权的政党,有太严格的纪律和章程,现在必须引进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化的群众于国民党,所以党的组织形式可以通融宽大些……要有政治俱乐部的性质”;谭平山在11月底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上反映了这些意见。到了1927年5月,共产国际也认为国民党的组织形式有改变的必要^②。但在实践中却无从着手。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形式的策略都有一个演变过程,其过程有三个阶段。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到中共第二次扩大会议前夕(1922年8月—1925年10月)为第一阶段。共产党人积极地从政治上、组织上参加国民党的改组,表现为两党的“密切同盟”。这一阶段虽有改变国民党组织形式,放松在国民党内的组织工作及退出国民党的酝酿,但并没有形成基本的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影响不大。中共第二次扩大会议到“三·二〇”事件前夕(1925年10月—1926年3月)为第二阶段。中共中央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形式由“密切同盟”向“政治联合”转变。中共中央开始有意识地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组织中的工作,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组织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三·二〇”事件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四·一二”与“七·一五”期间中共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合作(1926年3月—1927年7月)为第三阶段,这是中

① 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

② 见《谭平山文集》第39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共推行两党“政治联合”的阶段。

二

然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共合作中，如何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马林在建议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进行政治活动的同时就指出，“党则不需要放弃独立。与此相反，同志们必须统一他们在国民党中所采取的策略。”^① 1922年底，中央发言人在共产国际“四大”中指出：在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中，中共要争取国民党中的工人并团结小资产阶级群众，在组织和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同国民党竞争”^②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也指出，“在进行这项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该有别于任何其他政治团体而举起自己的旗帜”^③。然而，问题在于怎样在实践中坚持独立性。

中共“三大”曾在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进行了争论，经过争论，形成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该议决案指出，共产党人虽加入国民党，但仍必须保存自己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具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并强调党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要批评国民党的错误政策^④。国民党改组工作实际开始之后，中共在11月召开了三届一中全会，更进一步明确了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的中心地位。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发出了第13号通告，指示各地方组织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的改组事宜，并选派“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的

① 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认为：“国民党面临的任务要求它的组织形式作相应的改变，必须依据大力接近群众的路线尽快进行改组。”《文献》第一辑，第328页。

②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1页。

③ 《文献》第一辑，第62—63页。

④ 《文献》第一辑，第76页。

同志参加国民党“一大”，以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

那么，共产党人要不要全部加入国民党、工人群众要不要引导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在中共“三大”会议上，马林、陈独秀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存在着忽视了中共自身的建设和发展的方面。在国民党“一大”后，中共三届二中全会再次重申了这一主张，使这消极的方面更加明显。1924年5月，中共第一次扩大会议纠正了这种错误倾向，强调了共产党要独立地领导工人运动，把工人运动看成是共产党的根本工作，以此巩固共产党的组织；陈独秀在会后也表示，共产党“于国民运动以外，同时须特别注意劳动的宣传及组织，尽量促进其革命精神与阶级的意识，以预备社会革命的基础。”^① 这次会议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复苏，也使党的组织开始得到较大的发展。

要保持独立性，并不是说共产党人就不能全部加入国民党，产业工人也不应加入国民党。蔡和森、张国焘认为“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因为这样“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②。但这些思想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贯彻，中共“四大”又予以了一定的修正。

正是基于对独立性的这种认识，“五卅”之后，中共中央设想把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从“密切同盟”转变为“政治联合”，认为这是加强中共组织独立的重要方面，要在组织上与国民党划清。随着国民党右派进攻的加剧，这种观点在中共内却占了上风。因此，1925年10月的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中共同志在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尤其是国民党的高级党部。

^① 中共三届二中全会指出：“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如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文选》第一册，第183页。

^②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1924年，《六大以前》第137页。

第二次扩大会议的这一精神，在国民党“二大”前后虽未在实践中完全贯彻，但在“三·二〇”后，则成为中共的基本策略。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扩大会议再次强调不要包办国民党机关，应该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然而，却事与愿违。这一策略的实施，使国民党内右派的势力增大，共产党在国民党外的独立活动也逐渐受到了右派的限制。北伐军总司令部建立后，蒋介石以北伐为借口，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命令；北伐到了长江流域，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益暴露。在这样的形势下，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认为，要拉住日益右倾的国民党军事集团，必须限制工农运动。

1926年11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关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政府，“使国民革命的农村政纲有实际的表现”，并“帮助左派反对右派之懦弱而动摇”的指示传入中国后，中共中央关于独立性的认识似乎有了改变。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共产党人突破了“整理党务案”的限制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的工作，并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中共“五大”还认为，应无限制的引导工人阶级加入国民党，才能实现领导作用。但是，共产国际“并不企图以共产党分子代替左派之领导工作”^①，而且由于国民党右派的相继反动，中共中央对工农运动的主要政策仍然受到限制，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并没有使革命的农村政纲有实际的表现。

显然，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形式策略的演变正反映了其对于独立性问题的认识。在第一阶段（1922年8月—1925年10月），中共在组织上、政治上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并开始独立地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第二阶段（1925年10月—1926年3月），中共把工作重心移到独立地领导工农运动上，开始对在国民党组织上的中心地位有所放弃；在第三阶段（1926年3月—1927年7月），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63页。

中共进一步在国民党组织问题上退让，到1926年12月的汉口特别会议，又采取了限制工农运动的政策，这一策略基本上持续到国共合作的破裂。。

三

中共实行国共合作方针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是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

关于领导权，共产党人的文章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曾陆续有所提出，在中共“四大”就基本明确。问题的关键是在实践中怎样去争取领导权。

中共及共产国际代表，在酝酿国共合作之初，就提出了在国民党内存在左、右翼的概念。当时认为，要组织国民党内的工农为国民党的左翼，以促进国民党的革命化。但又认为，“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①。即是说，其一，国民党左翼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其二，这些左翼及与此联系的右翼都尚未形成。陈独秀还著文对此作了说明，并认为左派是革命派，右派是妥协派^②。当时的策略是，不要把国民党内反对我们的党员“遽目为右派”，我们应该“化右为左”，以免国民党的“左右之分歧”^③。

1924年5月的中共第一次扩大会议明确指出了国民党内存在着左、右两翼，认为“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同志其实是这派基干队”，其余大部分是右派，右派的特性就是妥协。中共的策略是用批评来“指责右派政策的错误”，“以迫国民党全体左倾”。显然，这是对以前策略的纠正。高君

①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74页。

② 《张国焘给威金斯基、穆辛的信》，1923年11月。

③ 陈独秀：《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向导》第62期，1924年4月22日。